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



新史学与新汉学

王学典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

新史学与新汉学

王学典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与新汉学/王学典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

ISBN 978-7-5325-6709-6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②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8385 号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

新史学与新汉学

王学典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插页 5 字数 330,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6709-6

K·1664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言

王学典

受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19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一众学人齐声高呼告别思想、走向学术,思想观念的反思、建构和争鸣遂让位于对学术传统的爬梳、整理和重续。在此语境下,学术史研究迅速取代思想史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焦点和热门,相关论作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畅行至今而不衰。

检点二十余年来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史,人们会发现,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路数、两条门径并存的局面。一种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

前一种路数的研究是治学术史的基础性、起步性工作。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具备了深厚的积累,可谓遍地开花、成绩斐然。就近代学术史研究而言,正统谱系之外的学术及学人得到相当透彻的挖掘,章太炎、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重返学术史并占据了显要位置,国粹派、学衡派、古史辨派、史语所派、禹贡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学术流派纷纷呈现在学术史版图上。以往现代学术史上那种唯物史观派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面貌大为改观,原本山头林立、众声喧哗的面目得到很大程度的还原。这些“点”的清理,使人们对近代学术史有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认识,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何谓学者、何谓学术的看法,其意义的确不可低估。当前学术史研究的繁盛首先要归功于这一路数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是以后永远不可或缺的。

后一种路数的研究是治学术史更高层级的工作。这一路数的工作往往是怀抱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某种观念工具,力图对学术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进行整体把握,进而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寻觅到一条恰当的路径。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如以“范式”概念分

析近代学术的变迁等等。但这一路数的研究总体上尚嫌薄弱，有治学术史者甚至刻意回避这种做法，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仍是当下现代学术史研究之大宗。

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发达而以问题为导向的路数低迷这一学术史研究现状的出现，可能首先与当下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上所述，1990年代的学术界重学术轻思想，沉潜于专深之学而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治学术史者对“事实”热衷对问题“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研究遭遇的深刻教训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介入学术造成的恶果，这一恶果使许多人因思想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关联而疏远了思想理论。1980年代以后，在学术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裹挟下，人们逐渐将科学性、客观性视为学术研究的首要标准。这无疑是学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无可厚非。但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对学术研究不光有相当大的伤害作用，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不可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泼掉。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问题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在制造偏见的同时也可能提供洞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种洞见则直接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是学术活动自身所无法产生的。毋庸置疑，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可以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注入动力，可以成为学术变迁的最积极、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思想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而规避之。

二是鉴于以往“以论带史”造成的流弊而排斥思想理论。将某种特定理论学说奉为金科玉律，进行推理演绎，导致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泛滥，历史研究实际上被抽空，沦为经典文句的注脚，这是“以论带史”的问题所在。这种极端做法必须克服，但是，简单地拒绝理论也不可取。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论需要概念，二者不可偏废。离开了理论和概念的引导，人们的认识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整体上毫无头绪，如一团乱麻。大量的、具体的事实或材料只是一堆素材，只有思想理论才能将这些素材变成学术。材料之于学术，就如同桑叶之于丝锦。没有理论和概念，材料变不成学术，没有春蚕的咀嚼消化，桑叶永远是桑叶。所以，如果运用得法，理论，只会深化和提升我们的研究工作。或者说，思想理论至少无损于学术，影响学术的只是对思想理论的误用和滥用。

前人论南北朝经学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

史·儒林传序》)上述两类学术史研究即分属于“约简”之学与“深芜”之学两种不同的风格。一味地追求“约简”而刊落“枝叶”固不可取,一味地追求“深芜”而遗其“英华”,尤不可取,且实属买椟还珠之举。“英华”与“枝叶”之间孰轻孰重?难道还需要商榷一番才能搞清楚吗?健康正常的学术史研究看来需要这两种路数相互配合,交互推动,相得益彰。两种路数的工作当然也不必完全同步,均衡发展,在某一段时间内,彼此之间有厚薄轻重之分乃属常事。但两种路数的长期失衡将对学术史研究产生不利影响乃至伤害。对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的轻忽,将导致学术史研究缺乏贯穿细节和事实的问题意识,缺乏统率全局的大线索,最终只能流于琐碎,只见“枝叶”而不见树木,更看不见森林,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进而,这样的学术史也就丧失了为当下学术研究指示门径的终极目的,剩下的就只是在那里空发思古之幽情,而忘记了学术史研究所应承担的描述学术变迁轨迹这一最主要职责。因此,强化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实乃当务之急。

那么,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从何入手呢?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寻找到一种用以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史事实的合适的观念工具。其中,“学派”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当然,学派流变不能等同于全部学术史,学派归属也不能展现学人的完整面目,甚至学派本身也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与当时学术、学人的实况存在一定出入。然而,学术史叙事却离不开派别的区分。通过划分流派来梳理学术史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不但历来如此,而且中外皆然。不划派根本无法叙事,至少是无法很好地叙事,也将难以处置驾驭如此繁多芜杂的文献、事件和人物。学术史不同于一般的论著目录解题,简单的堆积罗列并不合格,这一研究尤其需要清晰分明的脉络线索。这个线索和脉络当然只能是学术的“薪火相传”、知识的承上启下、学问的师生授受,分派叙述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大致说来,治学术史所用的“学派”包括以下三种意义:一是在实体的意义上,二是在“同门”的意义上,三是在工具和方法的意义上。前两种由于存在比较明确的形式上的联系或血统上的传承,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如“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就早已为学界公认。最可能引发争议的是第三种纯粹“方法”和“工具”意义上的“学派”,这主要是指在学术史上徒具“学派”之名而并无“学派”之实的学术群体。换句话说,一些以这派那派命名的学术群体在当时当世可能并不以本名存在,甚至有的本名仅是后世的人们出于某种方便所赋予的某种

称呼而已。再进一步说,那些名号众多的“学派”,许多仅充当了一种学术史家的叙事工具,它们自己并非当时当世的学术史事实本身。比如,在讨论两汉学术史时,人们常常使用“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恰是后人对治学路数不同的两群学者的指称,而且这两路学者存在并争斗了近四百多年,其成员既不同时,也不同意,根本称不上是什么真实的“学派”,它们实际上只是史家的叙事工具而已。但不能不承认,析分出今、古文后,两汉的学术史叙述起来更方便了。后来著名的所谓“乾嘉学派”,可能更是如此。

何谓“乾嘉学派”,看来已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分歧主要产生在对“乾嘉学派”本身的认定特别是对其内部诸流派的划分上。迄今为止,把“乾嘉学派”划分为“吴派”和“皖派”是一种主流看法,此一划分始自章太炎和刘师培。梁启超承袭了这一划分,但又提出清代还存在一个“扬州学派”。梁的三派说很得后来相当一部分学术史家的赞赏,以至有“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和“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这一有影响的概括。但近二十多年来,异议迭起,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在“乾嘉学派”内再细分流派,甚至认为,惠栋之学和戴震之学之间有着根本的共性,没形成对立的学派,“吴派”和“皖派”的提法本身是以地域“强分门户”的结果,“不符合历史实际”;二是认为即使再细分流派,也不应该是“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吴”、“皖”两派勿庸多说,而“扬州学派”实是“对戴震之发展”,“这两派实为一派”,“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1]持这一见解的学者还指出:“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派划分的主要标准则是“学派特色”。^[2]至于究竟如何划分才算合理,则言人人殊。关于清代学派问题的上述纷争,最典型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吴派”、“皖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以及所谓的“惠派”、“戴派”、“钱(大昕)派”等等,甚至包括所谓的“乾嘉学派”本身,均为后人所命名,当时既无这样的实体,更无这样的学派自觉,有的只是治学取向与研究路数不一的若干学者群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学派,与汉代的所谓今、古文学派一样,也都不过是后来的学术史家们手中的概念工具而已。清代的学派是这样,现代的所谓学派如“史观派”和“史料派”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1] 漆永祥:《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及相关诸问题》,《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 同上。

所以,运用“学派”这一概念工具进行学术史考察本身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必要,问题的要害在于是否能够精确运用,有利于学术史脉络的把握和认知,而不是妨害学术史真相的呈现。必须加以申明的是,观念工具不是绝对的真理,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学派”等观念工具的运用切忌绝对化。我们使用的“学派”这一概念工具,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概念的内涵是对对象的某些特征的提取、整合和抽象,但这些特征综合成这个概念的内涵后,就作为对象的重要表征而被强调了。这种概念并非对象的真正定义,而是一种观念的构造。只有借助于这种观念构造,才能将复杂现象秩序化。由于它只是分析经验的概念工具,与经验事实不会完全对应重合,因此无需由经验整体去证实或证伪,换句话说,对某种“理想类型”做这样的把握,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肯认例外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应望文生义,将学派的区分作僵化的、绝对化的理解,强行将一种观念与它所处理的对象严格对应。比如,一提到“史观派”,就认为这一学派完全不承认史料中的地位,一说到“史料派”,就断定这一学术群体完全排斥理论概念的作用。这样理解,无异于刻舟求剑,使观念工具与学术史事实凿枘难通,最终将学术史研究导入歧途。

基于以上想法,收入本书的诸篇论文在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和线索梳理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方面进行了若干探索和尝试,现结集出版,目的是抛砖引玉,求其友声。至于此一路数本身的成败利钝,则一任同道诸君去取。

序言 / 1

“20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 1

——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新史学与新汉学 / 35

——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72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 / 116

——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 / 130

“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 153

20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派史学学术转型考察 / 174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 209

两大学术谱系的对立和整合 / 219

——翦伯赞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附录

治学的功力与见识 / 227

“20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历史大概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叙述出来的。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呈现的。不过，学术史与普通历史有一重大差异，即学术史的原生态在被“历史”化后仍然存在，如文献书籍、期刊报章等依然存在下来供后人检视，而普通历史则仅仅存在于时人和后人对它们的记录之中，它们本身则在这种记录完成之后灰飞烟灭。学术史的主体是“学”，普通历史的主体是“人”，“学”可以完全寄托在文献中，“人”则死后如灯灭，无以整体寄托。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学术史比普通历史更可靠。20世纪刚刚过去，这一世纪的书籍杂志期刊绝大部分都还摆在那里，但是阅读不少20世纪学术史著作之后，我们依然会无所适从：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学术背景、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学术背景的论著，其中关于史家、史学流派、史学现象的评估差异之大，以及以这些评估为依据所绘制的20世纪中国史学版图的面目各异之显著，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这同一个研究客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描述？对这个问题，学界迄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解答。^[1]笔者对此问题也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1990年代中期，在出版《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时，笔者对此问题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自觉。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所谓“国学复

[1] 虽然学界发表了一些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如胡逢祥《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等，但是在论述角度与范畴上都不是针对此问题的。

兴”和所谓“重写学术史”、“重续学术谱系”之后，到写作《顾颉刚与他的弟子们》一书时，这一学术现象才在心中逐渐深刻起来，所以在该书“小引”中，我简要表达了对此一问题的看法。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也未能作更为深入的探讨。直到写作《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时，我才真正稍稍思考了这一现象，并试图给予解答。笔者的核心关注是：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究竟有无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下面提供给大家的，当然仍只是初步的思考。

一、20世纪中国史学叙事的变迁

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叙述无疑应该在这一史学形态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与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一同问世，到了1920年代，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古史论战”之后，中国史学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对它的总结和反思，于是开始。

最早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进行“回顾”且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王国维在1925年所写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1]王国维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和整理代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学问；而且，前四类合在一起，可与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汲冢书的发现并列为中国学问上的三大发现。王国维如此高度评价新史料之开发和研究，明显地影响了此后的学术史书写，初步确立了以史料工作为本位、以史料派为中心的叙事模式。

王国维此文，只是一次演讲的整理稿，严格来说不能算作有意识的学术史研究。有意识的学术史研究发端于1930年代。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中心，史料考订学派迅速壮大，取得了不菲的业绩。这为以“古史研究”为中心的史学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史学在人文学术各部门中异军突起。齐思和正是选取了这段时间，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总结、赞扬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得之成绩，^[2]他显然是以史料派为正宗和主流，虽然这不是当时史学界的唯一声音。持另一取向的学者，如朱谦之、冯友兰等，则取消了史料派的中心位置，只将其作为中国史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新学问》，《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2] 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朝华》第2卷第4期，1931年3月。

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而将史学的未来寄托于更新的学派。

朱谦之认为，考证史学成绩固然不少，但“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见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且误将作为历史辅助学科的史科学看作史学的全部，理应受到唯物史观派的“无情批判”。而唯物史观派也有“理论多而事实少”，“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的缺点。朱氏遂主张发起“现代史学运动”，以纠正当时考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颇。^[1]冯友兰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三个趋势：信古、疑古、释古。^[2]他认为“信古”“最缺乏批判精神”，所以持批评态度；而“疑古”虽然“对于史学也不无有所相当的贡献”，但是却有“抹杀一切”的短处；只有“释古”，“用一种批判的精神，向可疑与可信的各方面探讨，兼有疑古与信古的两种精神”。^[3]在冯友兰看来，“释古”正是“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4]与初出茅庐的齐思和相比，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当时史学界的观察深刻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尤其是依据“研究的特点”划分出“信古”、“疑古”和“释古”等史学流派，可以说是193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

1930年代的这些学术史研究还不能说很成熟，但其叙事已经出现了分流：在齐思和看来居于首席的史料派，在朱谦之笔下却只占一席之地，而且应让位于新学派。进入1940年代，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结和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叙事的差异也更加明显。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是继冯友兰之后从划分史学流派的角度描述史学界的重要文章。钱穆按照治学路径和治学目的，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个流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他认为“记诵派”与“考订派”的史学，“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而“革新派”由于其“能具系统”、能“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等，所以“多能不胥而走，风靡全

[1] 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1934年第2期。

[2] 冯友兰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鲠》第62期，1935年5月）两篇文章中阐述的都是这样一个观点；而常常被引用的《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一文，则是对“释古”的一点补充。后来他又在《古史辨》第六册《冯序》中对“疑古”与“释古”的关系进行了补充阐释。

[3] 参见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该文为冯友兰1935年5月19日在辅仁大学的讲演稿，后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4] 冯友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国”。^[1]对考订派史学评价如此之低，在当时的主流学界，是不多见的。

作为一部中国史学史名著，1942年出版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首次将中国近现代史学放在整个中国史学的大脉络中予以考察，从“史考”与“史纂”两个重要角度，认为“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与“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是近代中国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趋势。进入金毓黻视野的史家有：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李济、董作宾、郭沫若、陈寅恪、何炳松、陈鼎忠、曾运乾、柳诒徵、朱希祖、罗家伦、陈垣、顾颉刚、陆懋德。在他笔下，梁启超是新史学的第一重要人物，因此在两个脉络中都重点论及梁启超；胡适、吕思勉、钱穆三人只在“近世努力于专史之著”列表中露了一次面；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袖傅斯年，好像还没能露面。唯物史观派史学一字未提，郭沫若虽屡被提及，也都是缘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叙事进程中，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可以说是第一篇以“20世纪史学”为对象的经典之作。该文特别着重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考察1900—1941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把新史学的发生和发展看作是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是其基本预设，而认为近代史学存在着“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则为此后的史学史界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此文的目的不在论述“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同异与对立，所以文章并未专门论述“史料”和“史观”等问题，但是从对胡适、王国维、李济等人的赞颂与对郭沫若、陶希圣等人的批评中，仍可以看出周予同的学术偏重。

1945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1845年以来百年中国史学的专著，该书视野开阔，既兼顾大家，又包容各派，广义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尽收眼底，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而顾颉刚自己所言“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来作一个总结算”，更能说明其价值所在。^[2]因此，该书无疑是现当代中国史学史叙事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而该书最有价值之处，是作者以专家的身份，对各个时期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甚至各个方向上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代表成就给

[1]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钱穆所谓“传统派”大约相当于冯友兰所言“信古”派；“革新派”大约相当于冯友兰所言“释古”派；而其所谓“科学派”，即“考订派”，冯友兰所言“疑古”派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出了一个大致判断和排队，使得本书既具有史的总结的性质，又具有研究指南的价值，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学意义。此后，几乎所有论述20世纪中国史学的作品均无法绕开这部著作。此书当然算不上客观的学术史叙事，其局限和偏见也将在下文专门论及。

虽然顾颉刚、金毓黻、周予同等人在具体论述当中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怎样看待“史学编纂”方面的分歧较大。^[1]但是，说他们基本上都偏重史料考订，则不会存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后主流学界的其他几篇论著，在观点上与这些文章显著不同。

邓嗣禹《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一文，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发展。^[2]他既不站在史料派的立场，亦不站在史观派的立场上进行叙事，而是力图中立和超脱，严谨客观地评论了各派史学史家，特别是指出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两派是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的。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为依据，邓嗣禹也给所论各个领域的史学家排了坐次。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此文是“会通派”学术观点趋向成熟的标志性文献。^[3]它突破了此前学术史的叙事基调，也预示着新学术史叙事基调的出现。

对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史学进行了一个堪称全景式的扫描和判断，是邓嗣禹此文的最大贡献。他认为胡适、梁启超、顾颉刚、何炳松等这些“疑古派”为新史学运动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胡适，在历史研究等领域为青年树立了典范；而“考古派”一派，如王国维，对中国上古史及中世纪戏剧研究的贡献卓越；邓嗣禹对甲骨文、敦煌文书、明清大库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也很看重，并给予专章论述。在这些方面，他与顾颉刚等人并无太大出入。邓嗣禹最大的突破是把唯物史观派纳入了视野：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是“过去十年中两大

[1] 如顾颉刚认为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就是新史料的开发、整理、研究，他认为“通史”难作，因此对近代以来的“史学编纂”评价较低；而金毓黻则把“史学编纂”作为了近代以来新史学的两大趋势之一，评价较高。

[2] 邓嗣禹：《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编撰学》，李扬眉、周国栋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原载《远东季刊》（美国）第8卷第2期，1949年2月。

[3] 早在1930年代，冯友兰、钱穆就已提出了“会通”的主张；1943年，张绍良发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力行月刊》第7卷第4期，1943年4月），在对五四时代中国史的翻案工作（以“古史辨”为代表的破坏史学）与北伐革命后中国史的整理（以“社会史论战”为代表的建设史学）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独立的新史学体系。但冯友兰、钱穆、张绍良之文与邓嗣禹之文相比，显然还不是很成熟。

史学流派”之一；其次，认为唯物史观派的论著虽然“很不成熟，也常带有先入之见”，但是仍然承认“他们的确为摈弃王朝体系的传统编纂方式做出了切实功绩，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阐释”。^[1]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一字未提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在邓嗣禹这篇论文中却被专段论述，明确指出了它们的优缺点。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史前期中国社会》也被提及。

1949年发表的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是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此文只比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晚了四年，但是对于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括则大为不同。如果说邓嗣禹对史料考订学派学术史叙事基调只是突破，那么齐思和此文则是颠覆。在他笔下，民国以后的史学版图已由顾颉刚笔下史料派的“一统江山”，“改旗易帜”为唯物史观派在北伐后向中央位置进军了。虽然齐思和也给予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何炳松等几位史家较高的学术地位，但是规模已经大大缩小，像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公认的学术大师，甚至连专段论述都没有；虽然齐思和也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影响巨大，但是只给予了半节的论述，并放在全文最后；虽然齐思和也论述了“社会史论战”中的陶希圣等人，但是只有区区不到半页，而且对陶希圣颇有微辞。齐思和在弱化史料的开发与整理，突出史学编撰的同时，一改此前非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批评，认为“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2]在较为详细介绍郭沫若之外，李大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也被重点论及，给予赞扬。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董作宾、李济等人则一笔带过，傅斯年、陈垣等人根本没有进入文章。齐思和这篇论文，是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史学的第一篇，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第一次变迁的发生。

尽管史料考订学派受到了冯友兰、钱穆等人的批评，但是在顾颉刚、金毓黻、周予同包括冯友兰、钱穆、邓嗣禹看来，史料考订学派占据了史学界的主流

[1] 参见邓嗣禹：《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编撰学》，《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齐思和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惹人注目：“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在中国当代的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而在1946年，齐思和还对郭氏持一种批评的论调。他在评郭氏《十批判书》时说：“然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齐思和：《评〈十批判书〉》，《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地位，是一个事实。在他们绘制的学术版图中，史料考订学派自然居于中央。如果说各幅版图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史料派内部的安排、或史料考订这个中央辐射的范围不太相同。即使在齐思和的笔下遭到重创的史料考订学派，至少还保留了半壁江山。但是，在唯物史观史学家笔下，情况恰恰相反，“五四”以后居于史学版图中央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爆发，特别是进入1940年代后，唯物史观派学术阵营里的一些史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也进行了一些总结，譬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8月长沙新知书店版）就对此前的史学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想法，^[1]但这方面第一篇重要文章则是叶蠖生1941年8月发表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作为当时延安的革命史家之一，叶蠖生文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并首次将政治斗争引入史学史的叙事中。他从政治立场出发，运用政治标准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两大营垒四大派。^[2]叶蠖生认为，唯物史观派随着抗战不断发展，“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的主力，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唯心论的历史学者，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历史家……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权威。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3]这篇文章，当然满足了当时文化斗争的需要，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该文初步奠定了此后五十年间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叙事基调。

叶文发表三个月后，金灿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一文。金灿然将中国史学分为封建时代史学、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三个阶段。他认为，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是在西洋资本主义文明输入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它尚没有开出灿烂的花朵时，便已经凋谢了”。“五四”以后，尤其是自“社会史论战”起，“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显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4]从金

[1]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147、155页。

[2] 两大营垒为抗战营垒、日寇及投降派营垒。抗战营垒中又分唯物史观派和唯心论历史学者，日寇及投降派营垒又分日寇御用历史学者和投降派历史学者。

[3]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1941年8月。

[4]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金氏也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及各种历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材料的考证、地下材料的发掘与应用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给我们以卓越的借鉴”。

灿然这篇文章开始，“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等概念正式成为唯物史观史学史叙事里的核心概念。

唯物史观派这一时期另外一篇较重要的学术史文章是胡绳的《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此文是对1941年至1945年间唯物史观派史学成就的总结。胡绳认为这期间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客观的成就（当然主要是唯物史观派取得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就是优秀的代表。胡绳还赋予这些成就重要的意义：“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学术研究“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1]

1949年后的三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研究陷入停滞。这30年里，大陆史家在20世纪史学史叙事上，基本延续了叶蠖生、金灿然创立的基调。学术史研究的重新启动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此后的十多年，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白寿彝与尹达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两人在延续叶蠖生、金灿然创立的20世纪史学史叙事基调的同时，也有所调整、增补。

白寿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而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是大陆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篇重要的现当代史学史论文。该文只用了大约380字来论述民国期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将其划分为“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史学上仍然有他们的成绩”和“政治上反动”的两类。第一类在政治上并不是敌人，所以得到部分的承认。这一类史家提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冯承钧，虽然每人只有一句话，但在当时已属不易；而政治上反动的史家则连名字都没有提及。^[2]白寿彝此文中的主要观点在1983年出版的《史学概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该书说：“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而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诸流派，则要么是“旁流”，要么是“逆流”。梁启超、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

[1]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2] 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